

## 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sup>\*</sup>

涂豐恩<sup>\*\*</sup>

書籍史是近年來明清史研究中的熱門議題。受到歐美研究的啟發，明清中國的書籍文化史研究擺脫純粹技術史的研究，而改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切入，開拓了新的視野。當前所謂的書籍史，其實包含了出版文化、書寫文化與閱讀史等幾個不同面向，成為跨學科的新興研究領域。本文回顧近年來在中文、日文及英文學界的研究趨勢與成果，希望藉此展現書籍史研究的可能性，並展望未來的研究發展。

本文先回顧歐美書籍史的研究歷程，討論歐美學者針對書籍史研究曾提出的不同想法與概念，以及他們彼此間的差異；然後概論明清社會的出版文化及相關的問題，包括書價、識字率與出版市場的分布；接下來則討論明清書籍史中幾個不同的主題：首先是文學、書寫與閱讀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性別議題；其次是士人與明清出版文化的互動，我將把焦點集中在周啟榮(Chow Kai-wing)及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兩位學者的近作上；再次則討論明清時期技藝的文本化，與日常生活中的書籍。最後則對於有待解決的議題，提出個人的思考和反省。

關鍵詞：書籍史 出版文化 閱讀史 書寫文化

---

<sup>\*</sup> 本文的撰成，最要感謝王汎森老師的鼓勵。劉錚雲、Joseph P. McDermott 兩位教授及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特別感謝秦曼儀老師與我分享她對西方書籍史的豐富知識。

<sup>\*\*</sup>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 一、前言

明清時期的書籍史，是近年來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議題。2005 年，包筠雅(Cynthia Brokaw)與周啓榮(Chow Kai-wing)合編了《帝國晚期中國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sup>1</sup>是此議題最具代表性的論文集。其中收羅十位學者的作品，研究的問題從南京和福建地方的出版工業與市場、明清時期讀者群體的變化，到滿文書籍的出版、家譜的印刷。本書不僅讓我們看見書籍文化史豐富的內涵，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作者群中，至少一半以上有明清書籍史的專書即將出版或業已出版。<sup>2</sup>這無疑反應著該領域的熱烈發展。而在中文、日文與其他歐語中，明清書籍史的議題同樣逐漸受到重視。

學者重視明清時期書籍史，至少有兩個動機。其一，從前的中國書籍史研究，多從技術史的角度切入。誠如大木康指出，研究者看重的是技術的發明，或版本的珍稀，因此把重點放在活字版印刷術一類的發明，宋代的重要性自然也超過明清兩代。但這種書籍史，不外乎是科技進展的歷史，架空了書籍印刷的社會背景，也看不見書籍出版

---

<sup>1</sup>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sup>2</sup> 目前已出版的，就有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sup>th</sup>-17<sup>th</sup>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對於社會的影響。<sup>3</sup>但我們若從使用而非發明的角度觀察，就會發現明清兩代書籍的流通遠遠超越了前代。<sup>4</sup>尤其對照學者稱之「貧困化」出版時代的元朝，明中晚期以後出版事業的發達更顯得突出。<sup>5</sup>也因此，即便缺乏技術上的發明，書籍在明清社會文化史中的重要性依然吸引了學者的目光。

另一個研究明清書籍史的動機，則是為了修正傳統歐美書籍史的論述。在歐洲書籍史學者的筆下，傳統中國所慣用的雕版印刷，猶如中國歷史停滯不前的象徵。西方學者向來認為，活字印刷是歐洲進入現代世界的重要動力，中國卻因為各種的限制無法廣泛運用這種技術，也因此現代化的過程中落後於歐洲。但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卻認為，類似論調與歷史事實並不相符。唯有深入研究明清書籍史，才能反駁這一類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敘事。<sup>6</sup>

當前書籍史的研究，固然蓬勃，唯在中文世界中，除了數篇書評

<sup>3</sup> 中國歷史研究者對於宋代活版印刷發明的重視，也許不乏民族主義的心理因素。一篇關於東亞出版文化史的國際學術會議記錄中，來自中國的學者便認為，該會的特點，一是「充分地肯定中國是印刷術的發祥地」，二是「承認東亞文化圈以中國為中心」，第三點才是「研究內容著重微觀、基層和通俗」。見蕭東發，〈「第一屆東亞出版文化學術國際會議」紀要〉，<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5/55.htm>。

<sup>4</sup>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頁 5-7。關於技術史研究中，「發明」和「使用」的討論，見 David Edgerton 著，方俊育、李尚仁譯，〈從創新到使用——十道兼容並蓄的技術史史學提綱〉，收錄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性別》（臺北：群學出版，2004），頁 131-170。

<sup>5</sup> 井上進，《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頁 176-185。但也有學者認為，蒙元時期的出版狀況可能被低估，如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頁 4-6。

<sup>6</sup>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57-59.

外，尚未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廣泛的考察。<sup>7</sup>本文的目的不在提供新說，而是要回顧現有的研究，以此凸顯中國書籍史研究的可能性，和不斷開拓的視野，並提供有興趣的讀者一些線索。我將先回顧歐美書籍史的研究歷程，<sup>8</sup>其次對明清時期的書籍與社會做一概觀考察，然後分別討論明清書籍史中幾個不同的主題：文學與閱讀、出版與士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書籍。最後則提出個人的幾點觀察，希冀提供研究者進一步的思考。

## 二、書的生命史

1958 年，法國年鑑學派的奠基者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其學生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合力寫成《印刷書的誕生》(*L'apparition du Livre*; 英文版: *The Coming of the Book*)，大部分人將它視為當代書籍史研究的濫觴。這本

---

<sup>7</sup> 倒是有幾篇英文文章回顧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見 Michela Bussotti, "General Survey of the Latest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Nouvelle Série XVI (1998), pp. 53-68; Cynthia J. Brokaw,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Jan, 2005), pp. 135-165; Tobie Meyer-Fong,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3 (Aug, 2007), pp. 787-817.

<sup>8</sup> 歐美書籍史的研究，已有非常龐大的研究成果，並自成一研究社群，比如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 Publishing，見其網站 <http://www.sharpweb.org/>。礙於篇幅與學力，本文對歐美書籍史的回顧只能簡述其梗概。相關的回顧和討論可參考，秦曼儀，〈兩位書籍史家的方法論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和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臺北，2008.6)，頁 257-314；陳俊啟，〈另一種敘事，另一種現實的呈現——新文化史中的「書的歷史」〉，《中外文學》，34：4(臺北，2005.9)，頁 143-170。

出版於半世紀以前的書，究竟有何重要性？

費夫賀和馬爾坦開宗明義的表示，他們「無意編纂或重寫一部印刷史」，而且「本書不會冗長地解釋印刷術的發明，也不會重複一些老生常談，討論某個國家在印刷領域的領先地位、某位印刷大師如何比其他同業更形重要、某人在印刷的出現上應居何功，或是最早的印刷品由來為何。」<sup>9</sup>這段話點出此前書籍史研究的趨向與不足，也是費夫賀等人企圖超越的障礙。

費夫賀和馬爾坦想回答的問題，並不侷限於書籍印刷史本身，而是：印刷術的發明對整個歐洲歷史究竟造成什麼影響。比如，「它如何保存了十一到十五世紀間，前人所累積的道德、宗教、文藝遺產？」「有時歸屬於文藝復興，有時歸類於人文主義的各種新概念，在倡導的過程中，書籍扮演的推手角色，究竟有多成功？」<sup>10</sup>換言之，他們把書籍印刷的歷史，鑲嵌在更大的社會史框架中。這一點，無疑延續著年鑑學派創立時提倡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風格。不過，《印刷書的誕生》的出版，毋寧是個孤立的現象，並未立刻成為史學史上的「事件」(event)。對《印刷書的誕生》，《年鑑》期刊上不見評論與回應，在法國史學界對費夫賀等人的書籍史研究，追隨亦十分緩慢。<sup>11</sup>

同一時期稍晚，英語學界也出現對書籍史的反省，並由出身劍橋的紐西蘭史家麥肯錫(Donald Francis McKenzie)開了第一槍。<sup>12</sup>他認為文本

<sup>9</sup> 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2005)，頁18-19。

<sup>10</sup> 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頁22。

<sup>11</sup> 一些關於年鑑學派的研究，甚至沒有提及到這本書在費夫賀晚期思想的地位。如 François Dosse, trans. by Peter V. Conroy,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sup>12</sup> 關於英國書籍史研究(主要是書目學)的歷程，見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的意義絕不會簡單地由作者完成後便固定下來。相反地，文本從作者到讀者手中的過程，其意義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而不斷變化。這種說法或要讓我們想到後現代倡言的「作者已死」，但身為書目學家的麥肯錫，論點還不只於此。更重要的是，他十分精巧地提示我們：書籍印刷的「形式」本身是有意義的。不同的版本，字體的不同，排版的差異，都會導致不同的閱讀感受，也帶來互異的意義詮釋。他認為後者是我們研究書籍史的重點，並將之命名為「文本社會學」(sociology of text)。<sup>13</sup>

同是討論書籍在歷史上的意義，費夫賀和馬爾坦從宏觀的角度論述，麥肯錫從微觀的地方切入，這兩種研究取徑，在 1970 年代以後都各自有所發展。

1979 年，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巨著《印刷作為變革的原動力》(*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出版。<sup>14</sup>艾森斯坦延續著費夫賀與馬爾坦的問題意識，想要回答書籍印刷在歐洲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但他的結論比費夫賀等人更直接。《印刷書的誕生》把書籍印刷視為近代歐洲社會變化的重要因素，但也只是眾多因素之一，艾森斯坦則把印刷視為根本的原因，並認為印刷書逐漸統一了分歧的歐洲文化。<sup>15</sup>這樣的結論，當然也招致過於簡化的批評，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瓊斯

---

2005), pp. 7-9.

<sup>13</sup> Donal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0.

<sup>14</sup>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p>15</sup>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pp. 11-12.

(Adrian Johns)便認為，艾森斯坦誇大了印刷術帶來的轉變。<sup>16</sup>

另一方面，出身年鑑學派的史家夏提埃(Roger Chartier)，則提倡「閱讀史」的研究。<sup>17</sup>在他的帶領下，歷史學家逐漸發現，閱讀行為也會隨著時代的差異而出現轉變。比如中世紀，讀者多半將書中內容朗誦出來，但在近代歐洲，默讀(silent reading)卻逐漸取代這種習慣，而這樣的轉變，與歐洲社會對於私人空間的追求，恰好是平行出現的。<sup>18</sup>

夏提埃熟悉當代法國的哲學思想與文學理論，文章中也頗多唱和之處。<sup>19</sup>他和麥肯錫一樣關注文本意義的可能變化，特別注意讀者對概念的詮釋與挪用(appropriation)，並不斷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提出反省。一言以蔽之，夏提埃不只要知道讀者在讀些什麼，還要問：他們究竟是怎麼讀的？<sup>20</sup>

<sup>16</sup> Adrian Johns, "An 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 Revisite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1 (Feb, 2002), pp. 106-125. 關於艾森斯坦與瓊斯的辯論，見張谷銘，〈評介 Adrian Johns,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新史學》，16：1(臺北，2005.3)，頁 183-195。

<sup>17</sup>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eds.,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sup>18</sup> Roger Chartier,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 in Roger Chartier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Passions of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4-127.

<sup>19</sup> 這些興趣見諸他的方法論文字，Roger Chartier,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20</sup> Roger Chartier, "Popular Appropriations: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 in *Forms and Meanings: Text, Performance, and Audience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93-94; Roger Chartier,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3.

與夏提埃有不少辯論文章的美國史家丹頓(Robert Darnton)，則為書籍史提出新的視野。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我們應該從流通的角度研究書籍史，並提出了所謂「傳播的迴圈」(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見圖1)。<sup>21</sup>

丹頓認為我們應把書籍流通的每個環節都搞清楚，從寫作到出版，從印刷到流通，從銷售到閱讀。其次，還應該注意每個層次之間的關係，像是作者與出版者對於出版物內容的協商，或是讀者對作者的反饋。最後，則應該將書籍流通適當地置放於其時代與社會，並考察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唯有如此，書的生命史才堪稱完整。

丹頓自己的成名作《啓蒙運動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便是最佳的範例。<sup>22</sup>在書中，丹頓透過瑞士一家出版商所留下的大量檔案文件和五萬封書信，重建了《百科全書》在十八世紀的身世，包括出版的過程與盜版的問題，出版商對利潤的考量，並由此衍生而出的與作者的往復討論。當然，還有該書的傳播情形，以及它對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對丹頓而言，書籍史的研究，同時也是知識的社會史。而百科全書在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中，正好佔據了極為關鍵的位置，它的編寫、流通以及版本的改動，其實都照映出一整個時代與思想的互動。

按照丹頓畫出的藍圖，書籍史的研究仍有廣大的空白等待填補。只是，這些空白可能來自史學研究不可避免的困難，即史料的闕漏。此障礙若沒辦法克服，那理想終究也只是理想。事實上，丹頓之所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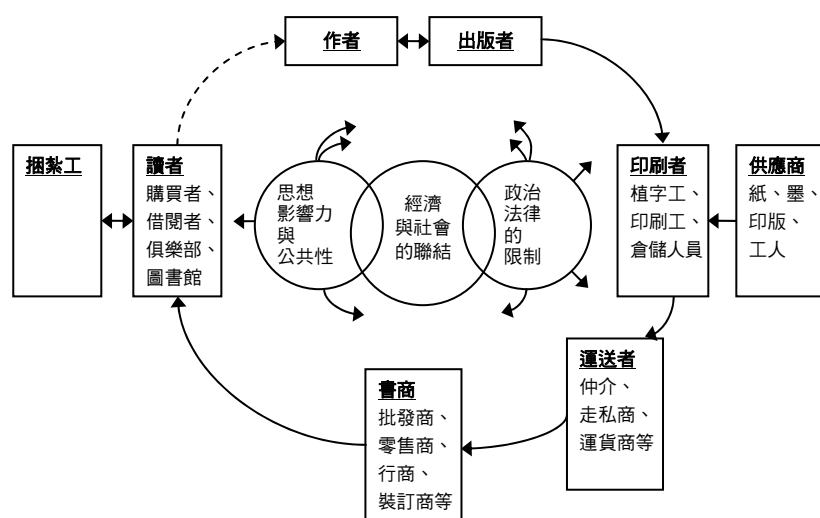
<sup>21</sup>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107-135. 該圖亦出自此書。

<sup>22</sup>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79).



能如此細緻而完整地寫出一本書的傳記，個人駕馭史料的高超功力固然令人佩服。但不可諱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幸運地在瑞士地方檔案館中找到一批極其珍貴、豐富，而且從未為人開發使用的史料。<sup>23</sup>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閱讀史的研究中。畢竟，我們幾乎很難找到直接的材料，紀錄閱讀本身的歷史。尤其當歷史學家開始注意庶民階層的閱讀經驗時，要解決相關的課題更是難上加難。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刺激出歷史學家大量方法論上的討論。

圖一



<sup>23</sup> 丹頓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見他的訪談，Maria Lucia Pallares-Burke,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2), pp. 165-167.

### 三、明清的書籍與社會

與丹頓標舉的理想相比，中國書籍史顯然有更多的空白地帶。然而，對中國書籍史家而言，丹頓的藍圖固然可援為指引，以此開拓多元的研究議題，但勢必也要更為靈活的運用這個構想。畢竟，中國史研究所要面對的史料性質，與歐洲有著明顯的差異。更何況，前近代的中國與歐洲有相當不同的歷史脈絡。比如在歐洲史上，國家曾對出版設有重重限制，出版特許權也因此成為歐美史家討論的重點，同時也是他們研究資料的來源，但中國史中就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機制。本文接下來的內容，便是要討論當前中國史家在研究明清書籍史時，主要討論的問題。

傳統中國史上關於書籍的材料或研究，向來不虞匱乏。各種書話、筆記早就是文人慣用的書類，也有人將史書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視為傳統中國書籍史的典型。<sup>24</sup>不過，真正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書籍史研究，則要到 1950、1960 年代以後才開始陸續出現。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是張秀民和錢存訓。他們兩位對中國傳統書籍史和出版史的研究，至今仍是重要的參考書籍。<sup>25</sup>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二位都是曾長期任職於國家或大學圖書館，這也反映了書籍史這門領域最初的學科歸屬。

另一個十分具有參考價值的是傳統文獻學的研究。這批出身中文

---

<sup>24</sup> Cynthia J. Brokaw,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pp. 135-137.

<sup>25</sup>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錢存訓著，劉拓、劉昕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造紙及印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系的學者，長期以來投入傳統藏書和刻書的研究領域。任教於大學中文系與圖書資訊系的潘美月教授就培養了相當多的人才。近來她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其中有不少是關於近世中國書籍史的主題。<sup>26</sup>這些研究還有一個特色，即以單一的藏書家或出版家為主。<sup>27</sup>

除了以上的研究之外，許多書籍史的通論性著作陸續出版，也有針對單一地區的書籍史研究。<sup>28</sup>這些書籍在資料上越來越周全，但部份也有明顯的缺點，如缺乏鮮明的問題意識，有些甚至僅止於書目堆砌。這些研究的累積，固然替後來研究者節省收集資料的工夫，卻也無法在學術上有進一步突破。

近二十年，許多中國史研究者逐漸從歐美研究中得到啟發。他們認知到書籍史的研究其實包括了寫作文化史、出版文化史、閱讀史幾種不同的方向。而書籍史本身也開始呈現多學科的整合與對話，除一般歷史學家外，還有文學研究者、藝術史家的助陣。其中有關明清書籍史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

文章的開頭，我們討論過學者注意明清時期的原因。在此，要進一步說明明清書籍與社會的基本情況。大體而言，明清兩代的出版業

<sup>26</sup> 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sup>27</sup> 略舉幾例即可呈現其中特色，如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嚴倚帆，《祁承燾及澹生堂藏書研究》；蔡文晉，《宋代藏書家尤袤研究》；蔡芳定，《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上述均收入於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還有一些收錄於《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論文叢刊》，如沈新民，《清丁丙及其善本書室藏書志研究》（臺北：漢美出版，1991），其研究進路也與上述類同。

<sup>28</sup> 如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其他的研究，見張志強、潘文年，〈二十世紀中國書史研究回顧〉，《漢學研究通訊》，22：4（臺北，2003.9），頁35-47。

要到明代後半葉才開始出現大幅的變化，嘉靖(1522-1566)和萬曆(1573-1620)年間，尤其是轉變的關鍵期。因此所謂明清書籍史，主要研究仍集中在晚明到盛清這一段時間。

當前研究明清書籍史的學者，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到底是哪些人在讀書？這個大問題的背後包括了幾個更實際的問題，首先，明清的書價狀況如何？一般人買得起嗎？

我們不難理解，書價本質上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因為同一個市場上，書價會因為種種因素而有極大的差異。而同一個時代的史料中，可能並存著極昂貴和極低廉的書價記載。換言之，我們不應該認為某個時代的書價是整齊劃一的。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指標性的答案。

日本文學史家磯部彰曾經主張，明代的書價甚貴，一般民眾根本買不起。因此，像《西遊記》一類的白話小說，主要讀者仍是來自士大夫階層。至於庶民，只能透過間接的方式接觸到《西遊記》的故事。<sup>29</sup>圖書館學家沈津也曾就善本中留下的蛛絲馬跡，探索明代時期的書價，雖未能得到肯定的結論，但同樣傾向主張明代書價是高昂的，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區。<sup>30</sup>

但當前幾個主要的研究，包括井上進、大木康、周紹明、周啓榮等人，結果均指向同一個結論：明清兩代的書價並不昂貴。<sup>31</sup>他們不僅收集材料，提出統計數據，同時也從書籍印刷的過程中尋找支援的

<sup>29</sup> 磯部彰，《西遊記受容史の研究》（東京：多賀出版社，1995），頁 25-27。

<sup>30</sup>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臺北，1996.6），頁 101-118。

<sup>31</sup>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第 15 章；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頁 121-128；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9-56;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pp. 9-42.

證據。從前的研究多稱揚活字版印刷發明的偉大，但當前的研究卻認為，雕版印刷才是最具有經濟效益的出版技術。雕版印刷不僅不是中國社會技術落後的象徵，相反地，它反映出明清出版商其實十分務實而靈活。對出版商而言，雕版印刷的過程簡單，雕工成本不高，加上此時的紙價也不昂貴，因而可以大量而快速的印刷書籍，明清時代的書籍出版也因此達到空前鼎盛。

除了印刷書外，此時的手抄本仍然相當普遍。傳統研究既然以印刷技術為進步的象徵，往往也就忽略了抄本在中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sup>32</sup>其實《明史·藝文志》就記載著當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sup>33</sup>而周紹明追隨井上進的結論，指出唯有到了明末，印刷書的出版量才稍微超越了手抄本。而且一直到近代，手抄本的低廉成本，讓它始終在中國社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sup>34</sup>

這些研究在告訴我們，雖然社會上也存在昂貴的書籍，但對明清社會的多數民眾而言，書是負擔得起的生活物品。大木康指出，在社會中層階級支撐下，明清書籍是相當「大眾化」的。<sup>35</sup>而上階層的人想要找到管道出版自己的作品，也絕不困難。總而言之，明清的書籍市場堪稱十分發達。

<sup>32</sup> 不同領域的學者已經逐漸重視到手抄本可能的意義之所在，比如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文樹德（Paul U. Unschuld），〈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抄本——被醫學史著作忽略的材料〉，收於傅漢思、莫克莉、高宣主編，《中國科技典籍研究——第三屆中國科技典籍國際會議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頁275-285。

<sup>33</sup>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96，頁2343。

<sup>34</sup>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ch.2.

<sup>35</sup>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頁89-121。

但購書和讀書是不盡相同的兩件事，買得起不意味看得懂。也因此，識字率和普遍的教育程度成了另一個棘手卻又關鍵的問題。1979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對清代的識字率，做了先驅的研究。她的結論是，十八、十九世紀中國，有基本識字能力(basic literacy)的男性約占 30% 到 45%，而女性則只有 2% 到 10%。<sup>36</sup>相較於同一時期的歐洲，這樣的識字率已經要高出一些。

但「識字率」本身是個相當模糊的概念。究竟需要認識多少字，才能被視為具有閱讀能力？採取的標準不同，則結論也會相去甚遠。比如伊維德(Wilt Idema)認為，要讀懂基本的中文書籍，至少應該認識兩千字。但羅友枝計算識字率，卻是以一百字上下為標準，無怪乎會產生爭議。<sup>37</sup>歐洲史的研究中，有人以「簽名」的能力，作為識字的指標，亦招致各式的批評。<sup>38</sup>此外，在前近代社會中，既無普遍的統計數字，究竟要如何估計整體的識字率？城市和鄉村的識字率更可能有極大出入。從羅友枝的專書出版至今，這個問題尚未獲得妥善的解答。<sup>39</sup>

無論是書價或是識字率的研究，都要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傳統中國過於龐大，各地域差異之大，或要讓人認為是「一個國家，多個世界」。於是，許多研究者捨棄宏觀的推論，轉而進行微觀研究。

---

<sup>36</sup>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 140.

<sup>37</sup> Wilt Idema, "Review: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oung Pao*, 66 (1980), p. 321.

<sup>38</sup> Roger Chartier,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 in Roger Chartier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Passions of the Renaissance*, pp. 111-119.

<sup>39</sup> 艾爾曼等人曾經從教育史的角度切入，迂迴地回應了這個問題。Benjamin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530-532.

這些研究泰半針對某一地區或是城市，盡可能深入、細緻且全面地研究該地區的書籍與社會。首先受到關注的自然是出版業興盛之地。

明代的出版中心，與整體的經濟市場分佈一致，主要集中於江南城市，包括杭州、蘇州和南京，一如胡應麟(1551-1602)所指出：「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薈萃焉。」<sup>40</sup>邱澎生很早就注意到蘇州的營利出版事業；<sup>41</sup>魏愛蓮(Ellen Widmer)研究杭州著名的出版商「還讀齋」；<sup>42</sup>賈晉珠(Lucille Chia)則研究明代南京的著名書肆聚集地「三山街」。<sup>43</sup>

在江南之外，明代還有兩個特別重要的出版地區，一是建陽，一是徽州，兩者在明代書籍地理學上的位置正好相反。建陽以低廉的出版品出名，現今可見的許多明代日用類書，皆出自這一地區。建陽從宋代開始興盛，在明代達到巔峰。賈晉珠改寫自博士論文的專書，便詳細研究建陽從十一到十七世紀的興衰起落。<sup>44</sup>位於江南一隅的徽州出版物則以其高品質而聞名，尤其插圖刻工之精細，不少徽州刻工因此被延攬至江南一帶工作。徽州研究在上個世紀末開始受到矚目，中國安徽大學的徽學研究中心，目前也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推動徽州

40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886，卷 4，頁 5。

41 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5：2 (臺北，1992.10)，頁 139-159。

42 Ellen Widmer, "Hsi-yu Cheng-tao Shu in the Context of Wang Ch'i's Publishing Enterprise," 《漢學研究》，6：1 (臺北，1988.3)，頁 37-63；Ellen Widmer, "The Huan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 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1 (Jun, 1996), pp. 77-122.

43 Lucille Chia, "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07-151.

44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書籍史的研究計畫，其結果值得期待。<sup>45</sup>

進入清代後，以上幾個中心似乎不如往昔光彩。但是包筠雅認為，這並非暗示著他們的「衰落」，而是由於其他地方的出版事業逐漸發達，縮小了這些地區的相對優勢。<sup>46</sup>周紹明也認為，明代書肆的分佈其實尚未普及，但到了十八世紀後則無此問題。<sup>47</sup>換言之，清代書籍史的發展，是全面性的發展，而非重心的移轉。

當然也有新的重心出現，比如兩朝首都的北京，明代已經是北方的出版中心。至清代的書籍交易更顯熱絡，廖振旺利用李文藻(1730-1778)的〈琉璃廠書肆記〉，重建北京書籍市場的分佈與貨源。<sup>48</sup>韓人留下的《燕行錄》中，也有許多關於琉璃廠的記載，可資為證。<sup>49</sup>

而位處福建的偏遠窮鄉四堡，則在清代以後取代了明顯衰落的建陽。包筠雅長時間關注四堡地方從清代到民國的書籍史，2007年終於將其成果出版成書。<sup>50</sup>他認為四堡的興起，正反映清代以後書籍出版遍佈於中國各地，低階層的人民更容易接觸到書籍。最近包筠雅則把眼光投到位處清代帝國西南邊陲的四川地區，成果同樣令人期待。他的研究提醒我們，從邊陲反觀中心，確實能提供非常精彩而新穎的見解。

---

<sup>45</sup> 關於徽州書籍與出版史的初步研究，可見徐學林，《徽州出版史敘論》（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

<sup>46</sup> Cynthia J. Brokaw,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pp. 157-160.

<sup>47</sup>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pp. 112-114.

<sup>48</sup> 廖振旺，〈初論乾隆朝北京城書籍市場的分佈與貨源——以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 53-100。

<sup>49</sup> 廖振旺也注意到了這些資料。另見楊雨蓓，〈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中國典籍與文化》，4（北京，2004），頁 55-63。

<sup>50</sup>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還有學者把焦點集中在個人身上。這些研究多半是透過單一的人物，細緻地勾勒明清出版的圖像、文人的交游網絡和集體心態。如大木康曾研究馮夢龍(1574-1646)，並和周啓榮不約而同地注意到明末大山人陳繼儒(1558-1639)；<sup>51</sup>周紹明以錢進仁作為明清書籍史的引子；<sup>52</sup>金文京則研究晚明文人湯賓尹的出版活動；<sup>53</sup>此外還有如南京的出版家胡正言、小說家兼出版家的余象斗等。<sup>54</sup>這些人在明清兩代，未必在思想上有特別的創見，錢進仁甚至不被視為讀書人，卻因為在明清書籍史上的位置而受到注意。

#### 四、書寫、文學與閱讀

在國際漢學界，文學史家可能最早開始注意西方書籍史研究，並將之應用在中國史研究之上。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磯部彰因為研究讀者群的問題而開始關注明代書價。另一位中國文學史家伊維德，也因為研究白話小說的歷史，而注意到識字率的問題。

1988年，長期任教於華盛頓大學的何谷理(Robert Hegel)在一篇小文章中，便為接下來十餘年書籍史和文學史研究的合流，劃定基本的研究方針。他以章回小說為例，指出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問題值得回答：

<sup>51</sup>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頁163-188；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39-141.

<sup>52</sup>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ch.1.

<sup>53</sup> 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收於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頁79-102。

<sup>54</sup> 見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新史學》，10：3(臺北，1999.9)，頁1-54；朱傳譽，〈明代出版家——余象斗傳奇〉，《中外文學》，16：4(臺北，1987.9)，頁150-169；蕭東發，〈明代小說家、刻書家余象斗〉，收於春風文藝出版社編，《明清小說論叢》第4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頁195-212。

書籍出版業的發展和小說的發展有什麼樣的相互關係？書籍生產技術和方式的改變，跟小說的普及化有什麼關係？書籍版畫插圖對章回小說有何影響？當時他提出幾個初步的答案：「江南經濟繁榮了，書商中心就搬到那兒去。在書籍商業發達的過程中，印刷的字體、印版的方式、書籍的裝訂方法都標準化了。……江南文人增多的時候，書坊增多了；書籍在物質上好看了，在圖繪上美術化了，在小說藝術上複雜了。……章回小說發達的來歷有經濟因素，這個結論是免不了的。」<sup>55</sup>

同一年，何谷理出版專書《閱讀帝國晚期的插圖小說》。何谷理的野心，顯然不止於研究明代小說的插圖。他受到夏提埃等人的啓發，觀察書籍的不同形式，並企圖理解明代一般讀者的閱讀經驗。<sup>56</sup>他一再提醒我們，明代的小說讀者群非常廣闊，如此方能造就小說的興盛。

跟隨著何谷理的角度，研究者也開始注意圖像在明清出版品中的重要性。比如同為文學史家的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研究晚明《列女傳》的各種版本，她發現書中的插畫越來越精緻。男性出版家們原是希望藉此吸引女性讀者，並擴大《列女傳》中的道德宣傳，但柯麗德指出，華美、講究的刻工，最後弔詭地淪為商業競逐的手法，或是文人間的賞玩。<sup>57</sup>此外，近年日漸興盛的視覺研究，也吸引藝術史家注意傳統中國圖書中的圖像文化，如馬孟晶便曾討論《西廂記》中插圖與晚明

<sup>55</sup> 見何谷理，〈章回小書發展中涉及到的經濟技術因素〉，《漢學研究》，6：1(臺北，1988.3)，頁191-197。

<sup>56</sup> 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up>57</sup> Katherine Carlitz, "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nü Zhuan*," *Late Imperial China*, 12:2 (Dec, 1991), pp. 117-152.

的「視覺性」(visuality)。<sup>58</sup>

當前文學史的研究，也不再侷限於作家「寫了些什麼」，而把書寫及文字流通的條件一併納入討論的視野中。最近一本題獻給哈佛大學退休中國文學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的論文集，雖未完全以書籍史為主題，仍取名為《中國的書寫與物質性》(*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顯示研究的趨勢。在該書中，以研究《儒林外史》聞名的喬偉就從印刷文化的角度重探《金瓶梅》書寫所受到的影響；羅開雲(Kathryn Lowry)的文章尤其有趣，她研究晚明「情書」在晚明的流通，與不同脈絡下展現出的意義，及其與個人情感的關聯。<sup>59</sup>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明代文學史中，同樣也把小說的出版和流通納入討論的範圍，超越了傳統文學史書寫的模式。<sup>60</sup>

但在最近的研究中，書籍與性別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在耶魯大學東亞系教授孫康宜倡導和領導下，美國漢學家挖掘出明清時代大量的女性創作，<sup>61</sup>並從女性的角度重新探索了明清時期書寫與閱讀的意

<sup>58</sup> 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臺大美術史研究集刊》，13(臺北，2002.9)，頁201-276。

<sup>59</sup> Shang Wei, "'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 Liu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187-238; Kathryn Lowry, "Duplicating the Strength of Feeling: The Circulation of Qingshu in Late Ming,"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pp. 239-270.

<sup>60</sup> 如李忠明，《十七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158-182、233-244。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sup>61</sup>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義。與孫康宜長期合作的魏愛蓮便曾發表了多篇文章，研究女性書信往來的寫作世界或是女性創作的敘事文學彈詞，她更指出清代作家侯芝(1764-1829)，已經相當活耀地參與女性彈詞小說的出版過程，並與男性出版商有許多交手經驗。<sup>62</sup>

而歷史學者的研究，則以高彥頤(Dorothy Ko)的《閨塾師》(*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與曼素恩(Susan Mann)的《綴珍錄》(*Precious Records*)最具啟發性。她們二人分別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中國女性，運用大量的詩詞材料，重建女性間的友誼和交往。

《閨塾師》的頭一章，高彥頤便注意到明末清初坊刻出版的發達，與女性的日常生活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繁榮的出版，不但推動了女性讀者兼作者的誕生，也導致了一個讀者大眾群的出現。」<sup>63</sup>女性不但可以讀、可以寫，更重要的，寫作的成果可以出版流通。高彥頤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下，原本閉鎖於閨閣之中女性，能夠透過文字，跨越家門高牆的限制，成為另一類公眾人物。許多無法寫作的女性，也透過閱讀，和原本互不相識的女作家建立聯繫。大量的出版文字，在史學研究上同樣有重要的意義，它讓我們終於得以窺見女性思考和閱讀的軌跡。高彥頤就透過女性讀者對《牡丹亭》的評點，精彩地呈現了女性的閱讀世界。<sup>64</sup>

<sup>62</sup> 魏愛蓮，〈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22：6(臺北，1993.11)，頁55-81；Ellen Widmer, "The Trouble with Talent: Hou Zhi (1764-1829) and Her Tanzi Zai Zaitian of 1828,"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1 (Dec, 1999), pp. 132-150; Ellen Widmer, "Considering a Coincidence: The 'Female Reading Public' Circa 1828,"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pp. 273-314.

<sup>63</sup>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31。

<sup>64</sup> 高彥頤，《閨塾師》，第2章，特別是頁86-120。

曼素恩研究十八世紀的中國婦女史，同樣注意到當代許多才華洋溢的女詩人。她說，這些女作家「在父權文化中，創造了婦女自己的論述，……隱隱然將欲沖潰禮教堤防的心潮與情思聲聞於外。」<sup>65</sup>但她也指出，十八世紀的女詩人，通常還身兼道德教化的提倡者，在這種雙重身份下，獲取正當的書寫權力。<sup>66</sup>換言之，我們不應該過份期望女性書寫能全然顛覆傳統的性別秩序。而且，正如高彥頤指出的，有時女性寫作附和既定的價值觀和男性讀者的期望，刻意展現出想像的陰性風格，反而更加鞏固傳統的性別角色。<sup>67</sup>

## 五、出版與士人

眾所周知，明代以後，科舉競爭越來越激烈。科舉競爭讓明以後對於書籍的需求量大增，但同時也製造出許多被排除在科舉大門外的學子。這些士人該如何面對落第後的生活？他們如何解決最直接的經濟問題？本節的討論集中在周啓榮與周紹明兩位學者的近作，他們對上述問題，有許多精彩的發揮。

周啓榮的研究，討論科舉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士人們如何在晚明興盛的出版業中尋找一條生路。<sup>68</sup>他指出，略有文采的人，轉往鬻文為生，許多商業出版家也抓住這個機會，與文人們合作，大量的出版

---

<sup>65</sup>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7. 中譯文見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104。

<sup>66</sup>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p. 118.

<sup>67</sup> 高彥頤，《閨塾師》，頁70-71。

<sup>68</sup>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以下的討論主要出自書中的第3到第5章。

品於焉產生。環繞著出版業，社會上出現一大批的「山人」，他們爲了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遂採取各種詭異的方式標榜自身，只求獲得注目。在市場機制下，文名與聲譽已經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周啓榮指出，明代出版品中，作者的頭銜從原本的官銜，轉變爲「名公」、「名家」這一類的稱呼，表示文名已經可以替代官名。另一方面，這種「文字的商品化」，也讓落第士人獲得成就感。當文人在編寫科舉所用的參考書時，似乎更能彌補自身在考場上經歷的挫敗。他認爲，這樣的文化產業是明代士商合流的一個面向：文人雖然從事的是商業出版，卻依然能保持儒家的身份認同。

周啓榮進一步研究大量的科舉參考書，特別提醒我們注意書中的「附文」(paratext)或「套式」(protocol)，像是書中的各種註釋，或是書籍文字的編排。他認爲在這些看似次要的地方，其實傳達了寫作者真正的心意。<sup>69</sup>他大膽指出，這些科舉教科書，不斷在挑戰甚至削弱官方的意識形態。因爲晚明的科舉參考書，往往夾雜了各式各樣對於經典的註釋，而落第作者自身的意見也暗渡陳倉於其中，結果是稀釋了一些正統(如朱熹)註解的重要性。越到後期，這些原本屬於附文的註釋竟反客爲主，在版面上佔據了最主要的位子，甚至完全捨棄經典正文，獨立成書。

應科舉而生的教科書，最後竟反過頭來影響科舉。經由科舉參考書，晚明文人直接挑戰考官的權威。下層文人成群結黨，形成一個新的論述場域，讓官方不得不重視他們的意見，甚至必須附和他們所提出的標準。周啓榮發現，文人結社的成員在科考中錄取率特別高，或許就是考官屈服於出版市場壓力的證明。

---

<sup>69</sup>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09-123.

周啓榮雖然認為明末出版之活絡，並不亞於同一時期的歐洲社會。但他也指出，中國社會中卻未曾如歐洲般出現一個「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因為出版物雖然削弱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力量，但所有教科書，最終仍是為了讓學子通過科考，並加入官僚組織的行列，因而無法催生一個獨立於國家的文壇。

周啓榮的許多論證都別開生面，亦不忘與歐洲史研究成果對話。不過，他的研究集中在晚明時期，讓人不禁想追問，清代以後隨著政治局勢的日漸緊繃，商業出版與官方意識型態會出現怎麼樣的變化？出版商與文人真還能肆無忌憚的發表議論嗎？周啓榮認為明代缺乏對於書籍的檢查制度，而大量的出版物，也遠遠超過政府所能掌控的範圍。清代的出版物更多，但文網之密，恐怕也超越前代。官方的控制，究竟對民間出版有多大的影響，出版商又如何回應國家權力的控制，是值得多加注意的問題。<sup>70</sup>

另一位研究書籍史的學者周紹明，其研究也圍繞著士人展開。<sup>71</sup>周紹明雖然也同意明代的書籍出版十分興盛，不過他也提醒我們不應該過份誇大晚明書籍的流通，因為至少幾個重要的現象值得重視。首先，晚明的士人並不容易得到正統的儒家書籍。一般讀書人，當然不難從市場上獲得科考所用的參考書籍，老百姓也可以至市場買到各樣日用書籍，但是自命正統的士人們，卻往往不屑於這一類商業出版產物。大部分研究者都注意到，隨著商業出版興盛，社會上也出現一股

<sup>70</sup> 卜正民(Timothy Brook)就認為清政府對出版品的管制，可能不如想像中嚴格。這問題牽涉到清代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控制力。見 Timothy Brook, "Censorship in 18<sup>th</sup> Century Chian: A View from Book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y*, 23:2 (Aug, 1988), pp. 177-196. 但有形的管制，與無形的政治壓力並不相同，後者可以造成出版者的自我審查，籍制力可能更大也更廣泛。

<sup>71</sup>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ch.3-ch.6.

強烈的批評聲浪。「惟知射利」便是最常被攻擊的一點，只是士人對於商業出版的反彈似乎尚未被仔細的研究過。

此外，固然有些公家的藏書可供一般人借閱，但這些書籍多半是通俗讀物，加上缺乏良善制度，偷書、毀書的現象層出不窮。至於私人藏書家花了相當力氣，四處收集各種珍籍，卻多半不願意出借外人。周紹明指出，書的保存在前近代非常不容易，天災人禍外，藏書家往往無法保證下一代能對書保持同樣狂熱，多數藏書家的子孫在他們的身後便積極變賣書籍。即便如此，書也只是從舊藏書家流入新藏書家手中，典籍依舊束之高閣。這些藏書家有些僅是來自生員階層，或並非士人，但他們從商業市場中致富後開始附庸風雅，藏書因此對他們而言是作為象徵地位的妝點，知識的實用性反是其次。周紹明於是說：「對我們而言，長江下游的藏書閣，是中國學術傳統強而有力象徵。但對當時來自湖南、廣東、江西等地的中國人，這些藏書，不過是將一些輕率地被稱為『中國文化』的知識鎖進了保險櫃中。」<sup>72</sup>

面對這種景況，讀書人也只能透過家族、友誼等網絡，想辦法取得書籍。這種情況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才出現改變。周紹明認為，十八世紀的學者終於開始大量的閱讀書籍，學者之間討論學問的書信也日漸增多，晚明許多詩歌酬唱的結社活動，也轉變為以知識的討論為中心。十八世紀考證學的興盛，正是以上這些現象的結果。

書籍的流通增加，主要是官方的力量介入。最重要的是《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在國家權力的徵集下，許多民間的圖書流入中央政府手中，並由官府將之刊行出版。從前學者多半將《四庫全書》的誕生，視為官方對於知識界的箝制與壓抑，但周紹明顯然給了一個不盡相同的詮釋。從這個角度，我們值得重新思考《四庫全書》的編纂，

---

<sup>72</sup>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p. 146.



究竟對清代的知識界產生什麼影響。

## 六、書籍、知識與日常生活

對士人而言，通過層層考驗，並正式晉升統治階層時，獲得的卻是另一種挑戰。因為科舉中講究的文學才能，其實不保證官員能處理繁複的行政工作。為了讓新任官僚能迅速上手，許多「官箴書」——也就是行政官員的指南書——應運而生。法國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認為，官箴書在明清社會中的意義，值得多加重視。他指出，即便明代以前類似的施政指南早已存在，但隨著書籍市場的成熟，明清兩代官箴書才大量出現，並且廣泛地流通。他更認為，明清時期對於官箴書有著更大的需求，反映的可能是國家機器的擴張。<sup>73</sup>

魏丕信指出，這些官箴書是爲了「使讀者對法律規章的複雜性有初步的了解，不至迷失在那些大部頭的典籍(按：指《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等書)中。……有些著作可以幫助讀者立即查找到所需要的內容，以解燃眉之急。」雖然這些著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卻有著廣大的閱讀市場，再版次數和盜版商的虎視眈眈就是明證。<sup>74</sup>

官箴書的現象，反映出明清時代書籍史的一個特色，或可稱之爲「技藝的文本化」。梁其姿研究明清時代的醫學入門書，便指出這些書中的內容相對的簡單，是爲了讓初學者儘快上手，因此「具有明顯的臨床經驗傾向，而不太強調理論或符合儒家道德的倫理要求。」<sup>75</sup>這

<sup>73</sup> 魏丕信著，李伯重譯，〈明清時期的官箴書與中國行政文化〉，《清史研究》，1(北京，1999)，頁3-20。

<sup>74</sup> 魏丕信著，吳旻譯，〈中國帝制時代晚期如何學習為官之道〉，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纂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200。

<sup>75</sup> 梁其姿，〈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收入《法國漢學》，第8

些書籍的作者們，也創造了許多歌訣，好讓習醫者便於背誦。

明清的商業書籍，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加以理解。近來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明清大量商業書與商人活動間的關係，比如《一統路程圖記》中清楚記載了各地的水陸道路，恰與此時眾多商人離鄉背井至各地闖蕩的情形有關。許多商業書已經是變相的百科全書，不但提供交易時的必備知識，通行各地的路徑指南，同時也包括養生、醫療等生活資訊。<sup>76</sup>這些商業書的製作、流通和閱讀，仍然有進一步開發的空間。

行政、司法審判或是醫療等專業知識，原是需要經過實作方能習得。但在明清大量入門書的出現後，閱讀文本已經逐漸取代了實作練習。另一方面，這些偏重教授技藝的文字，也取代了傳統對經典研讀的注重。值得注意的是，傳統著重技藝練習或是著重經典研讀的人，如何回應這種知識技藝傳承的新形式？而當這些入門書隨手可得時，人們對這些知識的態度和認知又會出現怎樣的變化？邱澎生分析明清法律書籍指出，對於明清時代刑部官員，研讀專業的法律書籍「其實都是身體力行的日常實踐。」但這種實踐也招致許多批評，比如袁黃認為：「流傳法律之書，多遭陰譴。」官員們因而要發展出不同的說詞，為自己的閱讀行為辯護。<sup>77</sup>

對於專業書籍的出版、流通與閱讀，我們至今的認知仍遠遠不足。對於專業書籍史的研究，很可能會增進我們對於傳統中國專業知識的認識，並開啓一個廣袤的研究領域。近年來就有學者針對傳統中國的「案類文學」投入研究，這些案類文學涵蓋了醫學、法學、佛學

---

輯，頁 160。

<sup>76</sup> 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1997）。

<sup>77</sup> 邱澎生，〈有資用世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33：1（新竹，2003.6），頁 1-43。

與儒學等等，非常值得繼續追索。<sup>78</sup>

不只專業的知識可以自書本中獲取，日常生活的常識亦然。明清兩代通行的日用類書，便成為民間生活知識的縮影。日本學者最早注意日用類書的重要性，<sup>79</sup>近年來酒井忠夫更帶領編纂《中國日用類書集成》，重刊建陽地區的日用類書，其中有許多是自仁井田陞以來積極收集的成果。<sup>80</sup>中文學界近幾年對日用類書也有相當出色的研究成果。吳蕙芳以萬寶全書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其後亦持續在此議題上耕耘。她藉著不同版本間的比較，爬梳日用類書知識的轉變。而她所整理不同萬寶全書版本，也十分具有參考價值。<sup>81</sup>

來自不同專業的史家也開始注意日用類書。藝術史家王正華考察日用類書中的「書畫門」。她發現，「福建版的日用類書建立一個不同於主流書畫論述的社會空間，其讀者雖知道當時的流行風潮，卻在書畫等文化試金石上，與文士等上流階層區隔開來。」<sup>82</sup>而她對日用類書史料性質的反省尤其精彩。傳統將日用類書視為明清社會的生活實錄，她認為有待商榷，因為「全本書籍是否皆如實登錄，又是否涵蓋當時日常生活所有的元素，必須先審閱其內容，判斷其成書目的、

<sup>78</sup> 見熊秉真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臺北：麥田出版，2001）；Charlotte Furth, Judith T. Zeitlin, and Ping-chen Hsiung eds.,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sup>79</sup>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平民教育〉，收於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國土社，1958）。

<sup>80</sup> 酒井忠夫監修，《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1）。

<sup>81</sup>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sup>82</sup>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社會空間——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9），頁44。

知識屬性與消費者性質。」<sup>83</sup>她也指出，日用類書雖然容納了各式的知識，但與啓蒙時代的《百科全書》有根本地不同。日用類書並非出自精英之手，兩者的研究策略也應該有所區隔。她建議與其試圖釐清編寫者的動機和意圖，不如改從接受者的角度，觀察日用類書在知識的傳播上，究竟有何重要性。最近醫學史家張哲嘉便採用這樣的角度，討論日用類書中的醫學門。<sup>84</sup>

另一個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卻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的是宗教書籍。傳統多從宗教思想的角度研究這些文本，但從書籍史的角度，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宗教思想如何傳播：哪些人印製這些書籍？其他人又如何取得這些書籍？在商業化日漸熾烈的明清時代，宗教的書籍史會出現哪些轉變？

近來積極提倡書籍史研究的包筠雅，第一本書便研究明清時代的「功過格」，她把這一類書籍的出現，擺在明清時代科學競爭日漸激烈的背景下，士人們藉著累積行善，希冀換取科考的成功。<sup>85</sup>梁其姿研究清代的惜字會，指出當時包括功過格在內的各式善書，在社會上相當普及。<sup>86</sup>近來香港學者游子安在善書的議題上投入最多精力。<sup>87</sup>

83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社會空間〉，頁4。

84 在張哲嘉之前，日本學者坂出祥伸也對日用類書的醫學門作過考察。張哲嘉在文中已檢討坂出祥伸的觀點。見張哲嘉，〈日用類書「醫學門」與傳統社會庶民醫學教育〉，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175-193；坂出祥伸，〈明代「日用類書」医学門について〉，《關西大學文學論集》，47：3（大阪，1998），頁1-16。

85 Cynthia J.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6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7），頁136-137、222。

美國的宗教史學者，也注意到宗教書籍在社會上的流傳。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指出，晚明的宦官、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妻子，往往贊助道教或佛教書籍的出版，甚至有些書籍來自中央的內經廠。清代增加地方教派的壓制，對宗教書籍的出版不如從前支持。<sup>88</sup>韓書瑞(Susan Naquin)對白蓮教的研究則指出，即便十六世紀以後印刷術已十分興盛，但到十八世紀，接觸宗教經卷最方便的路徑仍是加入教派。<sup>89</sup>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則是近代西方宗教進入中國後，所帶來的書籍與新的書寫。

## 七、結語

以上本文回顧了最近關於書籍明清史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議題的開拓已經遠遠超越前代，研究採取的視角也不斷推陳出新。上文已經陸續提及一些值得繼續研究的方向，以下，我想再提出一些有待討論的問題。

首先，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江南地區，這無疑是因為江南富庶的經濟，讓此地出版業居於全國領先的地位，不過我們也知道江南並無法代表全中國。江南以外，除了福建已經得到了相當注意，其他地方相對沒有足夠的研究，這無疑會影響我們對於書籍史整體的認識。

史料的限制可能是目前研究偏重江南的原因。不過，即便在江南地區，書籍史的史料其實也相當零散，研究者通常需要從不同種類的

<sup>87</sup>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sup>88</sup> Daniel L. Overmyer, "Values in Ming and Ch'ing Pao-Chuan,"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27.

<sup>89</sup> Susan Naquin, "The Transmission of White Lotus Sec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63.

書籍中披沙揀金，從零碎的片段中嘗試拼湊完整的圖像。近十餘年來明清時期大量的史料、地方資料被翻印出版，大幅擴充學者能使用的材料，但似乎帶給研究者更大的負擔。要克服這一層困難，或許需要藉著研究者的互相合作，並結合電子資料庫的使用。

其次，目前的研究多重視商業與私人出版。這種方向並無錯誤，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官方在明清書籍史上的重要性，官方的角色不僅在於壓抑和限制，同時也在積極的生產。官方擁有的龐大資本，通常是一般私人出版商難以企及的，因此可以採用昂貴的技術(如活字版)，並刊行成本高於利潤的書籍(如叢書)。周紹明的研究也告訴我們，在取得珍籍的過程中，官方的力量遠比一般私人有力，因而成為珍貴書籍流通的一大動力。最重要的，官方出版與商業出版有不同的性質，兩者間的關係未必是此消彼長，我們尤其要注意官方出版所具有的象徵意義。<sup>90</sup>

除了以上的問題，還有幾個書籍史中的關鍵議題值得重視。

首先是「作者」的意義。傳統研究並未留意「作者」的概念可能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動。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王汎森透過對《文史通義·言公》的研究，提醒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中國傳統的作者觀：「將文獻『依託』某人所作，代表什麼樣的作者觀？現代嚴格定義下的作者觀究竟何時興起？從官師分離到現代，『作者』的定義又經過幾次微妙的變化？」<sup>91</sup>

學者研究歐洲近代作者觀的轉變，多半認為啓蒙運動前後是出現

---

<sup>90</sup> 承 Joseph McDermott 教授告知，2008 年 6 月於巴黎召開關於中國書籍史的會議，內容即以官方與私家刻書為主題。

<sup>91</sup> 王汎森，〈對《文史通義·言公》篇的新認識〉，收於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5），頁 254。

轉變的重要時代。傅科(Michel Foucault)便曾斷言，這個時代逐漸將思想、理念和知識個人化，當代的作者觀也於焉產生。<sup>92</sup>不過也有研究認為，十八世紀將作者視為公眾啟蒙的僕人，個人的創造性反而不是最重要的。<sup>93</sup>有些研究則從法律和經濟的角度切入探問：何時開始出版商重視所謂的著作權？又是何時盜版變成了非法行為？同樣的問題，放在明清史的脈絡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明末的李贄(1527-1602)和陳繼儒都曾經被大量冒名過，但政府從未插手處理這種現象，出版商認為理所當然，大山人陳繼儒似乎也樂得讓自己透過盜版而名滿天下。這究竟傳達了什麼意義，有待思考。<sup>94</sup>

書籍流通另一端的讀者也需要更多的重視。雖然不少學者已經嘗試對閱讀史的各種問題提出解答，<sup>95</sup>不過還留有相當多的空間等待探索。「閱讀」行為本身代表的意義，就是個饒富興味的問題，周紹明提醒我們，對明清士人(甚至可能是對傳統儒家)而言：「閱讀本身就是一件道德行為。」<sup>96</sup>

若延續上一個問題，則我們還可以問，對讀者而言，「作者」是

<sup>92</sup>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James D. Faubion ed.,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8), vol.2, pp. 205-222.

<sup>93</sup> Carle Hesse, "Enlightenment Epistemology and the Laws of Author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7-1793," *Representations*, 30 (Spring, 1990), pp. 109-137; 轉引自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1998), p. 224.

<sup>94</sup> 邱澎生就提到，建陽的出版商余象斗曾在印行的書籍中大罵盜版商無恥，不過余自己也曾盜印南京出版商的書籍。見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頁 157。

<sup>95</sup> Anne E. McLaren,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52-183.

<sup>96</sup>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p. 177.

什麼？讀者與作者的關係又是什麼？丹頓指出，十八世紀的歐洲作家，如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人，都從素未謀面的讀者處收到相當多的回應信件。<sup>97</sup>但同一時代的中國，似乎就並未出現同樣的情形，或至少沒有留下可供考察的線索，原因何在？

至於閱讀史提倡研究讀者對於文本意義的挪用，是一個逐漸受到重視但成果不多的研究取徑。這或許又是史料的侷限。丹頓認為，要解決閱讀史中史料的問題，得採取迂迴的手段，至少先弄清楚讀者究竟讀了什麼，才能幫助我們回答他們是怎麼讀的。而高彥頤和周啓榮透過評點、註釋等附文所作的精彩研究，或許能提供我們一些啟發。

最後是比較的問題。目前學者在研究明清書籍史的同時，多半與同時的歐洲書籍史相互比較。但我們也應該注意中國週邊的地區，比如日本、韓國等等。研究日本書籍史的專家柯尼其(Peter Kornicki)就認為，這些地區與中國有密切的互動，許多歷史現象也更為類似，讓我們發現歐洲書籍史是特例而非通例。他從日本書籍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在東亞其他地區所書寫的漢文書籍，似乎很少被傳入中國當地，那麼究竟有多少曾經對中國產生影響？為何他們始終無法在中國激起強烈的反映？這些書籍與晚明耶穌會所帶來的翻譯書籍，有什麼差異？<sup>98</sup>

要回答這種問題，我們當前所需要的，已經不再是大而無當的

---

<sup>97</sup>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 157.

<sup>98</sup> Peter Kornicki, "Review: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2:2 (Fall, 2005), p. 380. 除了 Peter Kornicki 的著作 *The Book in Japan* 外，近年來另有一本關於日本出版史的英文研究，見 Mary Elizabeth Berry,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通史著作，而是具有問題意識，並經過深入紮實地研究的作品。相信這個業已蓬勃的領域，不久的未來就能讓我們看見更多精彩的成果。<sup>99</sup>

(本文於 2008 年 8 月 5 日通過刊登)

校對：吳欣芳

---

<sup>99</sup> 本文並未處理晚清以降的書籍、出版史，那是另一個豐富、精彩且引人注目的時代，《思與言》雜誌第 43 卷第 3 期曾規劃「近代中國的閱讀、出版與文化」專輯。其他的研究如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ristopher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陳平原，《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 13-69。我們也不應忘記，李歐梵在其《上海摩登》中便已處理過印刷文化與現代性的問題。見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53-95。

## History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view Article

Feng-en T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spired by scholarship on Western history, researchers from Taiwan, Japan, Europe, and especially America have tried to investigate Chinese book history from new perspectives. The recent studies of book history include not only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inting technology but also of written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By reviewing the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book history in Ming-Qing China,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point out the further potential issues in this fiel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book history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survey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jor topics in recent scholarships ar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riting, reading and publishing; the recent works by Chow Kai-wing and Joseph McDermott concerning literary professionals in publishing culture; the “textualization of techniques,” and books in everyday life.

**Keywords:** history of book, publishing culture, history of reading,

**written culture**